

人口结构变动对消费率的影响研究文献综述

王颖

武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 : 人口结构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旨在综述近年来关于人口结构如何影响消费率的研究成果, 探讨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教育结构、家庭结构、婚姻结构、人口的分布结构等因素对消费率的影响, 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 消费率; 人口结构; 文献综述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Influence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Change on Consumption Rate

Wang Ying

Wuhan College, Wuhan, Hubei 430000

Abstract : Population structure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ims to review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how population structure affects consumption rate in recent years, explore the impact of factors such as age structure, gender structure, education structure, family structure, marriage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n consumption rate,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formulating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olicies.

Keywords : consumption rate; demographic structure; literature review

自2020年特殊时期以来, 全球经济低迷, 投资乏力, 出口减少, 拉动内需, 扩大消费就变得尤为重要。然而, 中国消费率的持续下降, 2022年最终消费率为53.2%, 比2020年特殊时期时的54.7%还降低了1.5%。本文主要基于人口结构的视角, 从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教育结构、家庭结构、婚姻结构、人口的分布结构这几方面进行分析, 对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结论进行整理, 探讨人口结构对消费率的影响。

一、年龄结构对消费率的影响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种观点。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 把人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少年期, 此时消费者没有收入, 或者收入小于支出。第二阶段为青年期, 消费者通过工作获得收入, 此时收入不仅能够支付当时的消费, 还会有储蓄。第三阶段为老年时期, 消费者退休后收入水平降低, 可能入不敷出。因此少年时期和老年时期收入较低, 而消费较高。当社会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上升时, 消费上升。

大多数学者赞同此观点, 认为消费率和抚养比成同方向变动。Leff (1969)、Loayza (1999) 等国外学者人研究发现, 消费率随抚养比的增加而增加。国内学者于学军 (1996)、李扬 (2007)、彭文生 (2012) 等学者也认同此观点。

虽然这个观点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1][2]}, 但也有人提出反对的观点, 认为消费率随抚养比的增加而减少。国家统计局课题组 (2004)、李春琦、范兆媛, 周少甫、王芳 (2016)、盛来运等

作者介绍: 王颖 (1977-), 女, 武汉学院,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消费经济学。

(2021)、何巧云 (2022) 在研究发现, 居民消费率和抚养比呈反方向变动。

前两种观点中, 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是一致的。然而有些学者认为它们对消费率的影响是不同的。贺菊煌 (2006) 认为, 少儿抚养对消费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老年抚养比和消费率同方向变动。王霞、罗光强、谢卫卫 (2013) 认为, 消费率随着少儿抚养的增加而增加, 随着老年抚养的增加而减少。王聪 (2019) 等发现, 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显著降低消费水平和消费率, 但少年儿童比重上升显著增加消费水平和消费率。也有学者认为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与家庭储蓄消费率之间的关系无显著影响^[3]。Kraay 对中国家庭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消费率并不受到人口抚养比的影响。

二、性别结构对消费率的影响

人口性别结构一般用性别比表示, 即女性人口为100时相应的男性人口数量。男女有着不同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男性的

婚姻成本的也大幅增加，有彩礼、婚宴、蜜月、婚房等大笔的消费支出，导致有男孩的家庭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因此，Cole (1997) 指出人们会选择提高储蓄来进行财富积累，从而在婚姻市场上更有竞争力。目前，国内外大部分学者大都认为，性别结构失衡时，会增加家庭储蓄，并且这种影响对处于婚配劣势的一方更加明显。张晓波、魏尚进 (2009) 指出中国性别比严重失衡，拥有儿子的家庭不得不增加储蓄从而导致中国储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此结论在调研的70个城市都得到了印证^[4]，并且得出了结论，在1990-2007年间，50%以上的家庭储蓄增长都是由于性别比例失衡引起。Du和Wei (2010)认为，性别比例失衡，男性过剩，使得未婚男性其在婚姻市场中的匹配难度增加，家庭会通过增加储蓄，积累财富，提高婚姻匹配成功的概率，最终会导致该国储蓄率居高不下，而未婚女性的家庭则不存在储蓄动机。

部分学者认为不止男性，女性也存在竞争性储蓄动机。苏华山和吕文慧等 (2016) 认为，因为每个适龄未婚者都希望在婚姻市场具有优势，未婚女性也不例外。因此，处于婚配年龄段的未婚者都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正向影响。Wei和Zhang (2017)，认为有未婚女性的家庭，为了获得婚姻梯度向上匹配的动机，也会选择增加家庭储蓄提升未婚女性的婚配竞争力。张琳、冯捷 (2020) 认为，农村家庭受养儿防老思想的影响，依赖儿子养老^{[5][6]}，所以女孩多的家庭必须减少消费，以便有足够的储蓄来养老。朱雅玲、张彬 (2021) 研究了各省性别比例与消费率的关系，发现他们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于淼和高宇宁 (2021) 认为，有未婚成员的家庭储蓄行为因为未婚者性别、年龄不同以及家庭房产数量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在拥有一套或无房产的有25岁以上未婚男尤为突出。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较低的性别比会促进消费的增长。如任吴、秦敏 (2021) 认为，女性人口的增长对消费需求具有正向作用。盛来运，方晓丹，冯怡琳，刘洪波 (2021) 认为，女性正在成为中国消费市场的核心，中国消费市场的未来方向将主要取决于女性消费者。

三、教育结构对消费率的影响

教育结构是指各级教育在校生数占全部教育系统在校生数的比例。学者们在论述教育的重要性时^[7]，认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通过影响家庭的收入而影响消费，但是教育结构对消费率的影响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消费及消费率有促进作用。Schultz (1971) 指出，教育能形成长期的消费资本，改变居民的消费观念，改善居民的消费品质。Michael (1975) 通过分析教育对居民收入和消费观念的影响发现，受教育程度影响了居民购买力从而影响了消费。国内部分学者也赞同此观点。尹世杰 (1992) 认为，文化教育是消费的首要力量。周弘 (2011) 廖海霞，吴相谨 (2016) 认为教育可以明显地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8]，提高居民的消费。

然而，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教育对农村地区居民的消费存在

着一定的抑制作用。李翔和朱玉春 (2013) 认为，由于农村地区的有效供给不足，限制了高文化程度的农民的消费。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教育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应该分情况来讨论。不同教育结构对消费有不同影响。张学敏和沈丽媛 (2018) 利用模糊二元对比决策方法进行研究，发现中高等教育水平的家庭，消费支出最高。受教育程度是高中和研究生的家庭，消费支出低于受教育程度是本科的家庭^{[9][10]}。杨汝岱和陈斌开 (2009) 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扩招后，家庭的教育支出增加，家庭的储蓄增加，降低了家庭边际消费倾向，挤出了其它消费，从而使消费率降低。家庭成员一般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无收入而且需要家庭支持，高等教育比重增加的同时可能会通过缩短家庭财富积累，减少家庭消费。

四、家庭结构对消费率的影响

随着家庭结构发展变化，家庭结构也成为国内学者研究消费问题的重要变量。学者普遍认为较小的家庭规模的消费水平更高。Becker (1981) 认为家庭规模较小，成员的资源分配更为集中，消费率更高。家庭规模较大则会导致资源分散，消费率低。王跃生 (2013) 认为我国家庭户结构趋于小型化是有利于提高消费水平。倪红福等 (2014) 研究发现家庭规模对消费结构和储蓄率具有显著影响。王钦池 (2015) 分析发现家庭规模和人均消费呈反向相关，且家庭人口介于2-4人时规模经济效应最显著^[11]。詹鹏等人 (2020) 考察发现家庭规模小型化增加消费。傅崇辉等人 (2021) 通过预测中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及结构的变动趋势，分析发现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家庭因素在于单人户和两人户占比的不断上升。

五、婚姻结构对消费率的影响

婚姻结构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和家庭的消费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近年来，婚姻形式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包括单身、核心家庭、再婚家庭、同居伴侣等。这些不同的婚姻状态对消费率产生重要影响。

Shan & Gao (2019) 认为单身人群没有家庭负担，生活压力较小，消费率较高，但抗风险能力也较弱，在面临经济下行时压力较大，消费率较低，因而他们的消费率具有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传统的核心家庭则较为稳定。夫妻双方一起承担家庭消费支出，经济收入相对较高，故消费能力较强。Becker (1981) 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家庭在教育 and 娱乐方面的支出较高。Browning & Crossley, (2017) 研究表明，已婚夫妇倾向于长期规划，储蓄率相对较高。乔继红、张建平、景祥云、金博 (2018) 认为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会减少储蓄，增加当期的消费。

再婚家庭由于受前次及子女抚养责任的影响，消费较高。Hamplova & Le Bourdais (2009) 研究发现，再婚家庭在日常开支上的支出相对较低，但在教育和娱乐方面的投资意愿较高^[12]，

并且再婚家庭的财务规划更为复杂。

同居伴侣的消费行为介于已婚家庭和单身之间。Gustafsson & Johansson, (2012) 认为, 他们共同承担生活开支, 但法律约束, 因此在日常消费上的支出与已婚家庭相似, 但在储蓄和投资方面的意愿较低。

六、人口分布结构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迅速。人口从农村向聚集的过程中, 人们的消费观念, 收入水平都发生变化, 从而使消费率发生改变。城市化率对消费率的影响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

部分学者如谢晶晶、罗乐毅(2005)、李丽莎(2011)付波航(2013)等人认为消费率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提高。蔡跃洲(2010)认为, 城市生活的便利使得消费增加。城市建设使投资增加消费减少。两者的效果部分抵消, 故城市化率对消费率的影响

并不明显^[13]。雷潇雨、龚六堂(2014)认为, 消费率会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提高。但城乡居民消费率增长差距较大, 若城市化率增长太快反而会阻碍消费率的增长。

还有部分学者如范剑平(1999)认为, 消费率并不会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提高, 甚至消费还会随着城市化率的增加而减少。王飞(2003)、刘艺容(2006)研究发现, 消费率随着和城市化率呈反方向变动。

陈昌兵(2010)对上述两种观点都不认同。他认为, 消费率和城市化率呈“U型”变动。在城市化进程初期, 人口数量大幅增加, 然后基础设施不足。此时基础设施的增加, 增加了农村居民的就业^[14-15], 但此时的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 农村居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 从而消费较低, 故消费率和城市化率呈反方向变化。而在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之后, 投资减少, 此时主要发展重心转移到在第三产业上, 再加上各种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 农村居民收入增加, 消费也增加, 故消费率和城市化率呈同方向变动, 故消费率和城市化率呈“U型”变动。

参考文献

- [1] 陈冲. 人口结构变动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生命周期假说理论[J]. 农业技术经济, 2011(4):25-32.
- [2] 都阳, 王美艳.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模式: 对老年家庭的着重考察[J]. 人口研究, 2020(6):20-34.
- [3] 齐红倩, 刘岩.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家庭消费升级: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2020.
- [4] 王勇, 周涵. 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影响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19,(05):84-91.
- [5] 黄燕芬, 张超, 田盛丹. 人口年龄结构和住房价格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机理[J]. 人口研究, 2019(4):17-35.
- [6] 刘沛鑫, 王勇, 邹政伟. 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21,37(8):103-106.
- [7] 石明明, 江舟, 邱旭容. 老龄化如何影响我国家庭消费支出——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9(4):62-79.
- [8] 何巧云. 人口年龄结构和社会保障对家庭消费率的影响[J]. 商业经济研究, 2022(5):70-73.
- [9] 王聪, 杜奕璇. 人口年龄结构与我国家庭消费行为: 基于CFPS2016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 产经评论, 2019(4):136-152
- [10] 石芳. 人口年龄结构与家庭消费选择: 基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新探讨[J]. 商业经济研究, 2020(4):71-73.
- [11] 范兆媛, 王子敏. 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家庭消费升级: 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2):62-68.
- [12] 祝仲坤. 互联网技能会带来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吗: 基于C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统计研究, 2020(9):68-81.
- [13] 冯君莲, 文凤华, 何琳洁, 等. 我国高储蓄率的人口结构因素分析[J]. 湖南社会科学, 2004(2):92-94.
- [14] 陈钰芬. 我国居民收入、人口、教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居民消费模型的实证分析[J].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04,23(2):10-14.
- [15] 康建英.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消费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 2009(2):60-64.